

快速查询

搜索



-中国涉藏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导航-特色子库→西藏图片库 专题库

-中国涉藏图书题录检索数据库→图书导航 涉藏人物库 藏传佛教寺庙库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 资料中心 > 语言

分类检索

- 经济
- 民俗
- 宗教
- 艺术
- 医药
- 文学
- 历史
- 地理
- 社会
- 交通
- 学术
- 藏学
- 传媒
- 人物
- 教育
- 体育
- 科技
- 政法
- 语言
- 书评
- 环保
- 文化

## 当代藏语语法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作者：周炜 撰写时间：2002-12-02 09:39:39 来源：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

我国藏语语法的研究，大致由两部分组成，即藏族学者的研究和内地学者的研究。从时间上看，藏族学者的研究居先，内地学者在后。西方从19世纪末叶才有人涉足这一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藏语语法的研究，逐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我国内地对藏语的研究，首先要推明清两代编辑的《西番馆译语》，此后则是乾隆帝御制的《五体文清鉴》。进入本世纪30年代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藏语真正的科学研究才进入了一个新生代。[1]国外出现了高本汉、乔马、孔好古、稻叶正就、山口瑞凤等一些知名学者，国内，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心，在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于道泉等先生的倡导下，开始对西部边地的藏语方言进行调查。1930年，赵元任完成了对拉萨方言最初的语音记录。闻都在1948年完成了对德格方言的语音记述。在这段时间，李方桂、罗常培两位先生对藏语的研究都有突出的建树。当时的藏语研究，尚属初创，比较注重方言的记音和资料的积累，一般只涉及具体方言的语音研究，而语法等方面的研究则未能深入。[2]新中国成立以后，藏语的研究真正进入了黄金的时代。尤其是藏语语法的研究，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人才倍出。从藏语语法研究史的角度看，从50年代到本世纪末，近半个世纪的藏语语法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即80年代以前和以后的研究。

### 1. 80年代以前的藏语语法研究

客观地说，80年代以前的藏语语法研究又可分为70年代以前和以后两个时期。

70年代以前，国家的民族语言政策侧重于人才的培养和语言调查，[3]藏语语法的研究，主要完成了一些传统文法著作的出版和相关的基础研究。一方面整理出版传统的藏文文法著作，另一方面开展了大规模藏语方言的调查工作。

1.1. 出版了一些藏族历史上有影响文法注疏著作。1956年出版了《西藏文法四种》（图秘桑布扎等著，黄明信编，民族出版社。）。1957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色多罗桑崔臣嘉措的《藏文文法根本颂司徒大疏》。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司徒文法详解》，1958年，四川民族出版社也出版了《司徒文法详解》(si tu sum rtags vbrel chen)一书。这些传统文法著作的出版，对后来和当时的藏语语法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2. 编写完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藏语语法教材。1959年，胡坦教授的《藏文文法三十颂》，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的教材，既对传统文法著作《三十颂》进行了全面的介绍，又运用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做了一定的分析。该教材于1959年编写完成，并运用到教学中。1958年韩镜清先生编写了《拉萨口语语法》（中央民族学院油印本，1958-59初稿，1978年修订），该教材对拉萨藏语的词法与句法做了全面的分析，第一次指出了动词中有自主和不自主的区别。1964年，周季文编写了《拉萨口语文法》，这是一部较早研究拉萨口语的语法著作，它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较全面地描写了拉萨口语的语法体系，探讨了四个方面的问题：藏语中词素、词、词组和句子的区别与联系，十大词类的特点与用法，句法部分以谓语为核心分析了简单句的各种句型，单层复合句与多层复合句的区别等等。这一年，中央民族学院藏语教研室完成了《藏语语法》的编写工作，格桑居冕先生也编写完成了教材《藏语方言概要》。从全国的情况看，西藏民族学院、西北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学院及西藏一些高校，也都先后编写了一些既实用又有一定学术水准的藏语语法教材，很好地推动了藏语的教学。

1.3. 出版和发表了一些有开拓意义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这里首先要提到三部藏族作者的语法著作：才旦夏茸的《藏文文法详解》（1954）、桑热嘉措的《文法要义》（1954）、贡噶的《藏文文法简要及动词的用法》（1957）。这三部藏文文法著作的共同特点是既继承了藏族传统的文法的精要，又有一定的新的学术见解。尤其是才旦夏茸的著作对后人影响较大。进入70年代后，国内又出版了多部文法专著，如，1978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央金珠白多吉的《藏文虚词使用法》，1980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珍贝益西扎巴的《语门文法概要》，1979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桑热嘉措的《藏文文法简编》。

1.4. 从50年代到70年代，有关藏语方面的研究论文还不是很多，[4]在藏语语法方面，有金鹏先生于1956年在《语言研究》上发表的《藏语动词曲折形态在现代拉萨语里演变的情况》以及1958年出版的《藏语拉萨日喀则昌都话的比较研究》。[5]1963年，金鹏先生主编了《藏语简志》（初稿）。[6]由于金鹏先生的研究在当时比较突出，所以日本的《语言学大辞典》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藏语研究，是以金鹏等人的研究开始的。[7]这段时期还有几篇论文值得一提，这就是由瞿霭堂教授执笔的《藏语概况》、[8]韩镜清先生的《现代藏语和汉语在构词方面的共同特点》[9]等。前者全面介绍了藏语包括语音、语法方面的一些重要问题，后者则从词法的角度，对藏语和汉语进行了比较。

1.5. 1979年，《民族语文》创刊，少数民族语文的研究有了一块阵地，它也使藏语语法的研究更加活跃。据有关资料记载，在70年代，共有四部藏语语法专著问世：a.《藏文文法简编》，西南民族学院，1976年、b.《藏文文法概论》，毛尔盖桑木丹著，1979年、c.《藏文文法注释》，扎西旺堆著，1979年、d.《藏语口语语法》，王青山著。[10]论文方面，有金鹏先生的《论藏语拉萨口语动词的特点与语法结构的关系》[11]，该论文强调指出，现代藏语拉萨口语动词有4个特点：（1）自主和不自主的区别、（2）判断动词和存在动词各有一对含有不同语气的词、（3）动词的时态和体的表达方式用后附成分表示、（4）动词名物化有标志。

## 2. 80年代以后的藏语语法研究

继1979年《民族语文》创刊后，与藏族相关的多所民族院校的学报以及其他与藏学有关的学术杂志相继复刊和创刊，传统语法及现代卫藏方言的语法研究逐步走向了繁荣时期，从事与藏语语法研究的学者人数也不断增加。除了上文提到的金鹏先生、韩镜清先生等外，在这段时间内，还有一批相当活跃的藏语语法研究专家，他们是胡坦、格桑居冕、黄布凡、瞿霭堂、张济川等。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从下面几个方面来稍加介绍这段时间的藏语语法研究。

语言学家王钧先生在1980年10月的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就在题为《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情况》的发言中讲道，“藏语动词的变化是藏语语法研究中特别重要的部分。” [12]虽然语言学家们在8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王钧先生提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论文却仅有一篇，就是黄布凡教授的《古藏语动词的形态》。 [13]这是我国学者关于古藏语语法研究的一篇重要的论文。该文对古藏语动词的形态作了平面的分析，作者认为，古藏语中，有严整变化规律的动词将近占动词总数的一半，从动词的不规则变化也能发现它们具有一些局部的条件。作者所指的古藏语动词的形态是指8-9世纪的情况。从1981年开始，藏语动词的研究成为藏语语法中最活跃的一部分。据我们的初步统计，约有近20篇学术论文发表， [14]内容涉及藏语动词的时态、体、自动和使动、自主和不自主、动词的名词化、动词句以及动词和判断动词的用法等问题。

2.1.1. 对藏语语法的研究，尤其是卫藏方言的研究，有人认为有“时”有“体”两种，由有人认为只有“体”而没有“时”的范畴。80年代，金鹏先生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藏语的时态和“体”的研究上，发表了《西藏现代口语动词的时态和体及其表达方法-兼论动词的特陈式和泛陈式》。金鹏先生的论文题目虽然提到了“体”的问题，但论文更多的是论及了词的时态和式。他认为，动词的时态和式是用动词的后加成分和辅助动词来表达，后加成分着重表达时态，辅助动词则表达动词在各种时态里的特陈式和泛陈式。 [15]在《藏语拉萨话动词的式及其表达方法》一文中，金鹏先生专门讨论了藏语拉萨话里，动词“式”的语法范畴，提出它包括特陈式、泛陈式、判断式、推断式、拟测式、命令式和否定式7种。可见上述两篇论述的观点是一致的。

2.1.2. 藏语动词的名词化问题，是语言学家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藏语动词在句子中不完全象汉语那样自由，如汉语的动词可以直接作主语和宾语，而藏语的动词必须名词化后才能作主语。1991年，胡坦教授在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研究所的学报上发表了《藏语动词的名词化》一文，文中指出，“动词和名词是藏语中最开放、最能产的两种词类，也是构成绝大多数句子的骨干成分。它们虽然在语法上各有特点，职能上互有分工，但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换。这种转换大都有一定的形式标志。”胡坦教授认为，动词转化为名词的方式包括名词化后缀、分读和连读、词根复合、词根重叠、形式不变等5种，而动词短语转化为名词短语的方式包括附加后缀、动词重叠变音、语调变化等。王志敬的《藏语动名词探索》（《民族语文》1987-1）也分析了兼有动词和名词双重语法特征的动名词问题。

2.1.3. 藏语动词有自动、使动、自主、非自主态范畴，在古代藏语中，它们分别用前缀和内部曲折等方式来表示。近十几年，有格桑居冕教授的《藏语动词的使动范畴》、谭克让先生的《藏语动词的自动态和使动态》、车谦先生的《藏语动词的自主和不自主》等等论文发表。格文指出书面语和口语中使动范畴有两种表达方式：（1）曲折形式，如NKhol“沸”与skol“煮沸”，可称自动与他动范畴；（2）分析形式，如Nkhol par byed“使沸”，可称使动结构。从历史上看，曲折形式产生于分析形式之前。谭文将现代藏语中的“自动和使动态”归纳为7类。而张济川先生的《藏语的使动、时式、自主范畴》一文则是一篇综合性和理论性都比较强的论文，作者指出：藏语书面动词的自动、使动主要靠不同的前缀表示，声、韵的不同只出现在少数词中。现代藏语方言虽然还有少数动词有自动、使动的对立，但作为一个范畴已经不复存在了。书面语动词时式变化的基础是自动、使动，表达手段主要是前后缀的有无和变化，声、韵的变化是次要的。藏语既有语义上的自主/不自主范畴，也有语法上的自主/不自主范畴。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篇论文的价值在于它从前缀及声、韵的角度，对藏语的使动、时式、自主范畴进行了客观的、历史的考察，对我们从音系学角度把握其演变规律有一定的帮助。另外作者提出的使动范畴产生在前，时式范畴出现在后，而自主范畴形成的历史最短的观点也值得我们注意。

2.1.4. 对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的研究也是语言学家们很感兴趣的问题。瞿霭堂教授在80年代发表了《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的结构及其演变》。该文利用丰富的藏文和现代藏语方言材料，列述了藏文和现代藏语各方言动词屈折形态的各种结构模式，并通过方言之间的比较以及方言和藏文的比较，探讨了动词屈折形态演变的因素、方式和过程。

瞿霭堂教授指出，现代藏语动词已经没有形态成分的屈折变化，形态成分的功能转移到了词根的声母、韵母乃至声调上，因此，作者将藏语动词屈折形态分为同根和异根两类，最后作者就藏语动词屈折形态的演变的因素，即语音变化和形态简化进行了论述，指出了其演变的三个阶段，从而说明了藏语动词从有屈折到无屈折的内在演变规律。瞿文还指出，公元8、9世纪的书面语中有形态变化的动词占整个单音节动词的70%，现代安多方言中有形态变化的动词约占单音节动词总数的45%，卫藏方言约占30%，康方言最少。巴塘藏语动词本身已经没有曲折变化，代之而起的是动词的后置表达系统。

除了瞿霭堂教授的文章外，金鹏先生也曾发表《藏语动词表三时的屈折形态简化的两种途径》，对藏语动词屈折形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王青山的《青海环湖区藏语的动词重叠形式》、王会银的《藏语拉萨话动词的重叠形式》、江狄的《藏语动词曲折现象的统计分析》（《民族语文》1992-4）等也涉及了藏语动词的形态问题。

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提到张琨夫妇的“Perfective and imperfective in spoken Tibetan”

（台湾BIHP, 51.）分析了拉萨话的完成未完成的对立；“The persistence of present-tense reflexes in modern spoken Tibetan”（台湾《清华学报》第14卷1-2合刊1982）则指出，藏文中的动词有现在、完成、未来三种形式。拉萨口语中，有些动词只有完成和非完成两种形式，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本来有一个-s词尾，后者没有。非完成形式跟藏文的现在式相当，偶尔跟未来式相当。另一篇文章“The spoken Tibetan verb kùp”（《匈牙利东方学报》第19卷，1984.）专门讨论了拉萨话中动词kùp的形式、意义、用法和来历。

## 2.2. 藏语语法体系的研究

2.2.1. 从图弥开始的藏语文法，可以说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传统语法体系，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我们必须继承。但另一方面，随着语言学的不断发展，我们又必须用新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重新宏观研究藏语语法，建立符合现代藏语语法的新体系，为此，进入80年代以后，有不少著名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16]胡坦教授在《藏语语法的类型特征》中，从语序、形态、作格三个方面，以语言类型学理论为基础，对藏语的语法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关于藏语的语序，作者提出了四个特点：a. 动居句尾，b. 物主词居前，c. 位置词居后，d. 形居名后；关于藏语的形态，作者对动词的“三时一式”、使动与非使动、自主与不自主进行了形态学的考察；关于藏语的作格，作者指出了在使用上与一般作格语言的不同特征。作者最后指出，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藏语语法的三项常用的语法手段是语序、形态和格标志。从历史上看，藏语有文字以来，1300余年间虽然发生了不少变化，但三项特征基本没有变。因此，从亲属语言比较看，藏语语法的类型接近藏缅语族语言，跟汉以及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差别较大。但语法类型上的差异并不能否认汉藏语之间的亲缘关系，虽然二者分化的年代已久，它对构拟原始汉藏语以及探索语法演变的历史或许可以提供更多的线索和启示。

2.2.2. 瞿霭堂教授在《论藏语的语法体系》中则认为：藏语语法的研究手段参照了汉语语法的研究体系，而未建立自己的体系，为此，提出了一套建立藏语语法体系的构想。在论文中，他首先谈到了对语法体系的认识以及建立藏语语法体系的原则和方法；接着他从后置表达系统、形态简化、减缩现象、语序四个方面论述了藏语语法的结构特点；最后作者提出了建立一个以助

词为中心、形态为辅助的藏语语法体系的构想。

### 2.3. 格助词的研究

藏语传统文法历来对格助词的研究就非常重视，这种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图弥三布扎的时代。到目前为止，藏语语法的研究依然继承了这种传统，当然在理论方法和研究的着眼点上已经与传统有了很大的区别。张琨夫妇在“Eragativity in Spoken Tibetan”（台湾BIHP，1980。）一文中，分析了藏语中格助词的特点和用法，认为至少现代拉萨藏语不能算是一种作格语言。胡坦教授的一些研究文章中也探讨了这一问题，认为藏语不是印欧语那样的主格·宾格对立型的语言，它虽然具有一定的作格·宾格对立型语言的特征，但不是典型的作格语言。藏语格助词的用法受语法、语义语用等多种因素的制约（见《民族语文》1984-1、1992-4、1993-5）。文国根先生的论文《略论藏文的gi字的演变》，是运用语言学史的理论方法对“gi”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助声“gi”的书写形式的演变构拟框架。[17]而胡书津、于康容的《藏语文法“la sgra”格助词语法意义浅析》[18]、贺文宣的《藏文典籍中的属格助词的特殊用例之我见》[19]，则是通过实证，对格助词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作了语法形式上的分析，对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格助词的语法意义有一定的帮助。类似于这样的论文还有谢广华的《论藏语结构助词》等[20]。龚煌城在《藏缅语的格助词》（台湾《西藏通讯》1988）一文中则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属格\*-?yi、与格/位格\*-a和对格\*-du是原始藏缅语的三种格助词，他指出，“拿来跟阿尔泰语言的格词尾比较，可以找到形态功能都相同的字。除这些字以外，书面藏语还有表‘与格、位格、对格’的格助词-ru及-la，也可以在阿尔泰语言中找到对应的字。”他认为“这些词汇上的一致并非巧合，而是由于藏缅语受了阿尔泰语言的影响，从那里移借过来的”。

### 2.4. 词汇、句法、句型的研究

2.4.1. 藏语除动词以外，其他的内容也是很丰富的，因此围绕这些内容所发表的论文也比较多。[21]1986年，胡坦教授发表了《藏语并列式复合词的一些特征》一文。文中指出，“复合词的逐渐增多是藏语发展的明显趋势之一。现代藏语里，复合词的数目已经远远超过了单纯词。构成复合词的方式多种多样，并列式是其中比较能产的一种。”接着论文从组织成分、词性、语音、语义构成、内部语序安排六个方面，对藏语并列式复合词进行了分析；最后，在解释复合词逐渐增多的原因时，论文指出：“并列式构词法在藏语里构词能力强，活力经久不衰，由此造成的并列式复合词也日渐增多……究其原因，大约同两个因素有关：第一跟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格外讲究结构对称、对偶、对仗的构词造句的心理有关；第二同这些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双音节化的倾向有关。音节整齐、结构对称、成双成对，这似乎是东方文化里经常被视为和谐美的一种现象。因此从研究的角度看，此文值得一读。

关于词汇的研究论文还有俞敏的《汉藏同源谱稿》（《民族语文》1989-1/2）、《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1）、《汉藏虚字比较研究》（《中国语文学论文集》日本东京光生馆1984），这是一组系统研究汉藏语亲属关系和同源词语的论文。作者一方面借助藏语同源字窥测汉语上古音，一方面通过确凿的语料和史料论证了汉藏语的亲缘关系。黄不凡教授的《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84-5）和《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综录及遗留问题》（《民族语文论丛》1集，1984）对现存伦敦大英博物馆馆藏编号S1000中的用藏文注音的汉语词语进行了详细考辨，订正了前人的若干错误。郑张尚芳的《补敦煌〈藏汉对照词语〉残卷考辨订误》（《民族语文》1990-6）对前人的缺释和疏误作了进一步的补解和订正，并对残卷所反映的语言现象作了细致的分析。

此外还有下面一些文章也论及藏语的词语问题：王青山的《藏语佛教与藏语》（《藏学研究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和《谈谈古藏文词汇的拼写法》（《民族语文》1981-4）、高丙

辰的《藏文藻饰词浅说—兼谈藏语的同义词》（《民族语文》1980-1）、结昂的《工布藏语构词法》、许云的《藏语书面语形容词构词法初探》（《藏语文研究》第2辑西南民院1989）、胡坦先生的《藏语中的随欲名和随立名》（《藏学研究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等。

2.4.2. 藏语句法的研究有胡坦教授的《拉萨藏语中的几种动词句式的分析》。胡坦先生对藏语动词的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非常注意动词与句中其他成分的关系，从而揭示动词与句式的内在联系。他于198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首次运用动词的“配价”（或“向”）理论探讨了藏语的几种动词句式，描写了名词的“格”和动词的“向”（即配价）的复杂关系。文中认为，藏语简单句式的核心是动词，按其同前面名词语的关系可以分为单向、双向、三向动词句。

85年，胡坦教授开始关注藏语句型的研究，发表了《论藏语比较句》[22]，分析了藏语中“甲比乙如何”句式。他指出，这类比较句有繁式和简式，明比与暗比，单项、双项与多项比较，比异同与比高下；此外比较格标志在现代藏语各方言中也有很多差别，有的方言中比人与比物使用不同的格助词。胡坦先生的另一篇文章《拉萨藏语中的“是”字句》专门分析了藏语中“甲是乙”这类判断句型，特别对比了藏语中两个“是”字（yin 和 red）在用法上的区别、对换和中和现象，以及古今判断句之异同。关于句型研究，格桑居冕教授也有几篇文章，如《论书面藏语单句的两大类—陈述句语祈使句的结构》和《藏语复句的句式》（《中国藏学》1995-1；1996-1），前文根据句子的用途和语气将藏语句子分为陈述句和祈使句两大类，各有一套语尾组词作为区别标志。这些区分标志古今书面语也不尽相同。后文则分析了书面语中复句的类句式与关联词语。

2.4.3. 除的论文外，还有王青山先生的《藏语方言语法中的几种特殊句法关系》[23]、贺文宣先生的《藏语典籍中常见的长句结构形式及修辞特色》、[24]谢广华先生的《拉萨藏语的句法结构》[25]。车谦先生的《试论藏语动词在句子中的核心作用》、陈来嘉措的《谈藏语语法中的能所关系》（甘肃民族出版社1986）。谢文根据谓语动词的特点将藏语的基本句式分为四类：以yin为代表的“是”字句；以yod为代表的存在句；以chag为代表的断字句；以byed为代表的作字句。车文认为藏语6种句子成分中除定语外，主、宾、状、补均在某些方面受制于谓语动词。长句在一些藏文典籍中，特别在一些典籍篇首的赞颂词以及其他一些文学作品中是比较常见的，但在以往的研究中，除了在一些语法书中见到过有关藏语复句的研究材料外，对长单句的研究几乎还不多见。贺文第一部分分析了构成长单句的种种原则，第二部分分析了理解长句容易出错的几种情况。

## 2.5. 藏语和藏缅语研究

藏语语法的研究，在90年代以前，基本还是一种比较封闭的研究，这从上面介绍论文内容也可以看出来，进入90年代以后，藏语语法的研究同藏缅语语法研究[26]、汉藏语语法的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正是这种局面，拓宽了藏语语法的研究空间，并从方法论和理论体系上给语语法的研究带来了一次深刻的冲击。从理论体系上看，藏缅语语法的研究，是将藏语语法的研究纳入自己的整体语法中，并通过语族内部各语言的语法共性的研究，来揭示语族语法的共同特征，因此，从本质上说，藏缅语族语法的研究，实际上也包容了藏语语法研究本身，所以我们在论及藏语语法的研究时，必须提到藏缅语族语法的研究。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有关藏缅语族语法的研究的论文大约有十多篇，[27]内容涉及动词研究、语法体系研究等。

2.5.1. 在多数藏缅语中，动词有自动、使动态范畴，考查自动、使动态的有无，揭示其语法特征及其表现形式，对于了解藏缅语族内部，包括藏语在内的各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及藏语语法本身都有一定的意义。杜若民在《藏缅语使动范畴的历史演变》一文中，通过藏缅语族内部各语言的比较，对藏缅语使动范畴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提出了藏缅语动词使动范畴的演变经历了一

个从粘着到粘着与词根屈折并存，再到词根屈折，最后转变为分析形式的过程的观点，毫无疑问，这种观点对认识藏语动词使动范畴的演变是极有帮助的。

2.5.2. 藏缅语人称代词各范畴的研究，是近几年孙宏开教授的研究课题，1995年，他发表了《藏缅语人称代词格范畴》一文，列举了包括藏语在内的20种藏缅语人称代词的格形式，指出它们分别用代词词根的辅音、元音、声调等屈折手段表示格语法意义，并对各种不同形式的来源作了分析，指出了它们与格助词的关系，并解释了目前藏语中一些不同形式的人称代词可能是历史上格屈折变化的遗存。孙宏开教授的研究对于我们了解藏语人称代词格范畴的特征以及与其他藏缅语的区别是有很大帮助的。

2.5.3. 进入90年代以后，语言学家们对语法结构的类型非常感兴趣，除上述胡坦教授的论文外，1992年，孙宏开教授也从类型学的角度完成了《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历史演变》的研究课题。他指出，藏缅语族的语法结构类型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一个历史过程：粘着型→屈折型→分析型。论文接着分析了一些重要的语法形式从粘着向屈折型演变的途径和方式，论证了分析型语法成分的来源和发展趋势。论文认为，原始藏缅语为粘着型，它与现在多数分析型藏缅语之间存在着一个演变链，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演变与语音演变有密切的关系。

2.5.4. 1991年，黄布凡教授发表了《藏缅语的情态范畴》。文章认为，在我国藏缅语中形态变化比较丰富的语言中，有一些语法现象表现了说话人自身的动作行为与主观意识的关系以及说话人对他人动作行为的感知情况等语法意义。应该将这种现象作为独立的语法范畴即情态来研究。黄布凡教授利用藏、景颇、羌语支的语言材料论证了藏缅语情态范畴的概念，这对于我们认识藏语的情态范畴是有理论价值的。

2.5.5. 下面我们来看看90年代以后的汉藏语语法比较研究的情况。从现有资料看，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大约有十多篇，[28]内容主要涉及代词、动词、虚词、被动语态、语言形态等。

1986年，金鹏先生发表了《汉语和藏语的词汇结构以及形态的比较》。文章认为，汉语和藏语虽然一向被认为是同一语系里的两个重要语言，并且有不少重大相同之处，但从发生学上看至今还没有做出正确的证明。作者希望通过比较，对两个语言的词汇和形态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作者的研究结果认为：汉语和藏语的词汇结构特点为，除一部分词是由单音节单独构成外，还有由单音节词素构成的复合词，有由单音节词(包括复合词)带有成词的附加成分构成的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等。[29]关于形态，金鹏先生认为，汉语和藏语都是有形态的语言，它们的词汇的粘着成分分为三类：一类是成词的，一类是构词的，一类是构成临时词。

瞿霭堂教授对汉藏语词汇的研究侧重在虚词，1995年，他发表了《论汉藏语言的虚词》一文。作者认为，虚词是汉藏语言语法体系的一个主要特点，汉藏语言的虚词可以分为汉、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两类。作者从理据性、形式上的两面性、多面性和多源性等方面讨论了虚词的特点，从定位、定指、关联和整合4种作用研究了虚词的功能和形式，提出了建立汉藏语言的虚词学的设想。作者认为，这种设想为创建真正符合汉藏语言特点的语法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从孙宏开教授和瞿霭堂教授的研究对象看，前者注意藏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相互比较，而后者是整个汉藏语系的比较，这基本体现了汉藏语法研究的两种思路。象马如珍的《汉语藏语代词用法比较》、谢广华的《现代藏语汉语动词比较》、车得驷的《汉藏语被动语态表达形态的对比试析》、金鹏先生的《藏语拉萨话和汉语普通话(口语)代词的比较》等则属于前一类，其研究目的在于通过汉藏两种特定语言的比较，揭示出它们的异同；而包括瞿霭堂教授的另一篇论文《论汉藏语言的形态》在内，则是着眼于整个汉藏语系，其目的是要建立宏观的语系语法体系。

## 2.6. 藏语传统文法的研究

藏语传统文法的研究，是现代藏语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藏族新一代的语法学家或者说语法学学者们运用新的语法理论和方法，对藏语语法进行审视和研究，这是当代藏语语法研究的一大特点。此外，随着藏语和藏语语法研究自身的发展，重新对传统文法进行解释和研究，这则是当代藏语语法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从1980年到1993年前后，藏族学者用藏文完成的藏文文法论著大约有20多部，此外还有不少零星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一些相关的学报和期刊上。从内容上看，这些专著和论文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2.6.1. 从某种意义上说，藏族当代语法学家们较好地继承了传统文法研究的方法和理论，在研究中注意对传统文法的宏观把握和整体的介绍，并注重解释一些疑难问题和带有普遍性的语法问题。比如：察朱阿旺洛桑的《藏文文法讲义》[30]、央金阿旺的《文法集要》[31]、巴雄罗布桑朱的《藏文文法知识》[32]、才旦夏茸的《藏文文法讲释解》[33]、吉思阿旺洛桑的《文法释疑宝鉴》[34]、才旦夏茸的《图弥文法》[35]、格桑居冕的《藏文文法教程》[36]、恰白次旦平措的《嘎列文法释难》[37]、沙弟仁青顿朱的《文法注疏》、[38]扎西旺堆的《藏文文法讲义》[39]、娘须庆绕维色的《三十颂详解》[40] ]、毛尔盖·桑木旦的《藏文文法概论》[41]、土丹平措和仁丹的《藏文文法问答》[42]、毛尔盖·桑木旦的《藏文文法概要》[43] 、多识的《藏语语法论集》[44]等 。

上面这些著述都是80年代以后出版的藏语文法著作，它们对于藏语文法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象格桑居冕的《藏文文法教程》（汉文版为《藏语实用文法》，北京民族出版社。）一方面以传统的藏文文法纲要为参照系，另一方面又运用现代语言学知识对传统的藏文文法体系进行了新的认识和补充。该书除了对一些语法重点的分析比较透彻外，对一些理论问题探讨也有独到之处，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传统文法的体系。

2.6.2. 藏族新一代的语法学家除了注意传统文法的宏观研究外，近年来还出现了一些微观研究藏文文法专著，象胡书津教授的《书面藏语常用关联词语用法举要》，[45]就是其中一本。该书从藏语常用关联词入手，分别从并列关系、连贯关系、选择关系、递进关系、转折关系、条件与假设关系、因果关系、目的关系8个方面，分析研究了书面藏语的基本类型和特征。从研究内容和研究角度看，此书与传统文法的研究已有一定的差别。

1, 2

[打印本稿][关闭窗口]